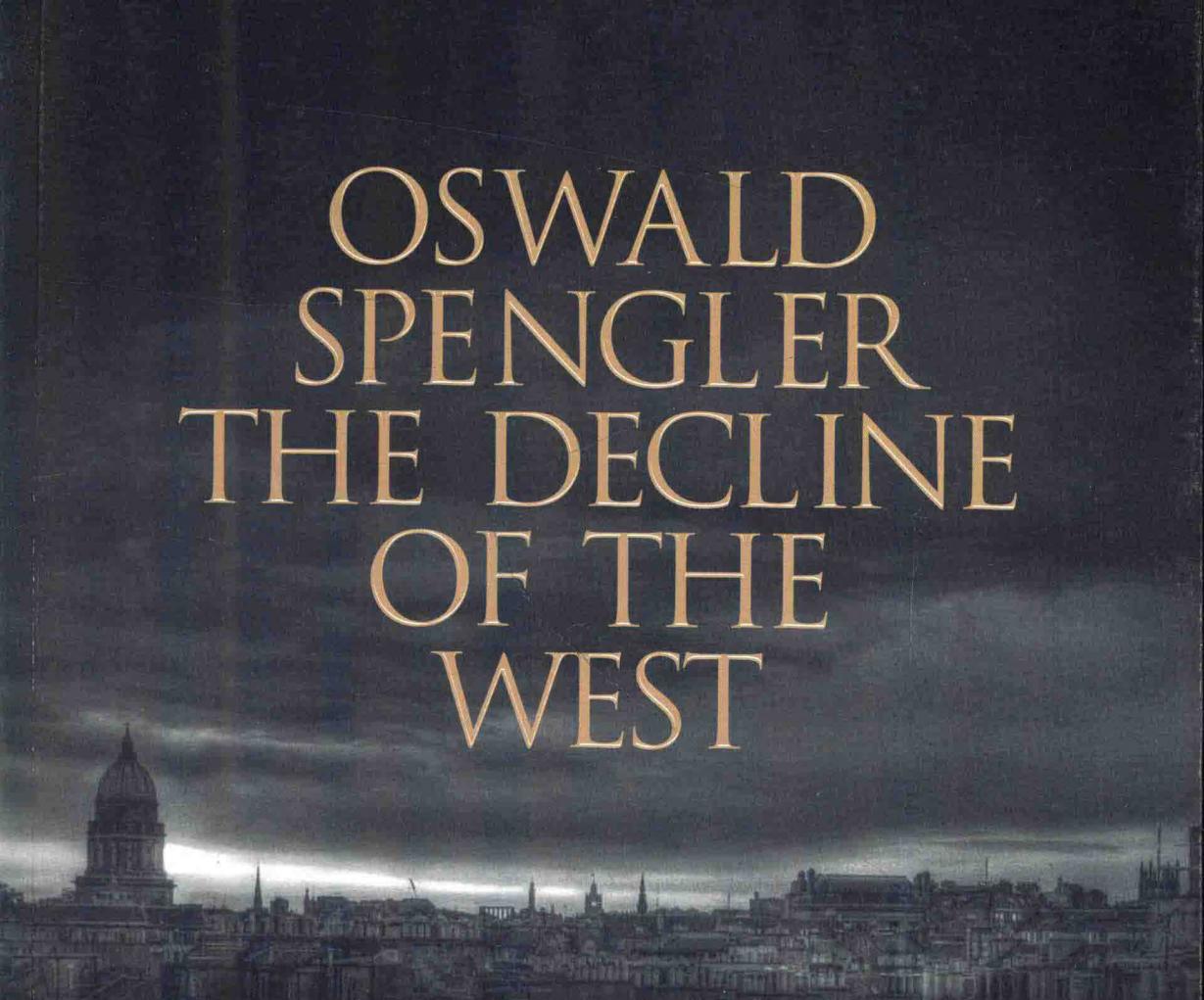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西方的没落

·上册·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著

齐世荣 田农 林传鼎 戚国淦 傅任敢 郝德元 译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西方的没落

·上册·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著

齐世荣 田 农 林传鼎 戚国淦 傅任敢 郝德元 译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的没落 : (全 2 册) / (德) 斯宾格勒著 ; 齐世荣  
译.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80256-666-8

I. ①西… II. ①斯… ②齐… III. ①历史哲学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2805 号

责任编辑：杨青

封面设计：陆红强

出版发行：群言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址：[www.qypublish.com](http://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https://qycbs.tmall.com> (天猫旗舰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qunyancbs@126.com](mailto: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42

字 数：604 千字

书 号：ISBN 978-7-80256-666-8

定 价：98.00 元 (全 2 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德意志中心论是比较文化形态学的比较结果

——评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sup>①</sup>

齐世荣

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他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哈雷、慕尼黑、柏林等大学，毕业后任教中学，代表作是《西方的没落》。据他自称，这部书构思于1914年以前，到1917年春天重新加工整理，在某些细节上予以增补和修饰。第1卷于1918年出版，第2卷于1922年出版。在第2卷中，已经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西方的没落》一书看作基本上反映斯宾格勒在1917年以前的思想，但也部分地反映他在战后初期的思想著作。他的其他著作有《普鲁士精神与社会主义》(1920)、《人和技术》(1931)、《决定的时刻》(1934)等。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的《导言》中，说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这本书是第一次的大胆尝试，想去预断历史，想去研究一种文化宿命中的迄未被人经历过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关于那在我们这一时代和我们这一星球上唯一正处于完成状态的文化，即西欧美洲文化的各个阶段。”<sup>②</sup>但是斯宾格勒并未单纯就这个主题予以论述，而是把它包裹在一个哲学体系中，并大言不惭地说，他是在撰写一个“我们当代的唯一哲学”。<sup>③</sup>斯宾格勒的这种做法，并非自他作始，德国人一向有“创造体系”风气。恩格斯说：“我们德国人有一种非常严肃的，即彻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精神，随你怎么说都

<sup>①</sup> 中译本由齐世荣等6人译出，商务印书馆1963年1月第1版，1993年7月第3次印刷。中译本只包括全书的第2卷和第1卷的《导言》以及作者第一版序言、作者修订版序言。

<sup>②</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1页。

<sup>③</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17页。

行。当我们每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他首先要把它提炼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主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历来就是为了最后引到这个新发现的绝妙理论上来。”<sup>①</sup>恩格斯还指出,像杜林先生那样“创造体系”的人在德国并非个别现象,各式各样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甚至大学生也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恩格斯讽刺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产品。”<sup>②</sup>斯宾格勒就是杜林之流的人物,他的“高超的胡说”也可看作“德国智力工业”的一种产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名牌”产品。

斯宾格勒既然对他的哲学体系十分自负,下面就让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当代的唯一哲学”究竟包含些什么内容吧。斯宾格勒把他的哲学体系叫作“比较文化形态学”。他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只有各个文化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就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历史。伟大的文化是根源于灵性的最深基础之上的,每一文化都有其基本的象征,表现于这个文化的各个方面。“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在其本质的最深处,它们是各不相同,各有生存期限,各自独立的”。<sup>③</sup>他甚至认为,“没有单一的数学,而只有不同的数学”。印度数学思想、阿拉伯数学思想、古典数学思想、西方数学思想各不相同,与这每一种数学思想相对应的是一种数字类型。<sup>④</sup>而且,各个文化之间是互不了解的。“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sup>⑤</sup>

斯宾格勒认为,要研究由各个文化组成的世界历史,必须采用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新的研究方法,他称之为“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即“把一种文化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sup>⑥</sup>予以考察和理解。抓住这种形态关系以后,“即使平凡单调的政治事实也具有一种象征的,甚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695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4—345页。

<sup>③</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21页。

<sup>④</sup> 查理·弗兰西斯·爱金孙的英译本,第1卷,1926年版,第59、61页。

<sup>⑤</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109页。

<sup>⑥</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5页。

至形而上学的性质”。<sup>①</sup> 于是,在他看来,“在微积分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政治的朝代原则之间,在古典的城邦和欧几里得几何之间,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距离武器制胜空间之间,在对位音乐和信用经济之间,原有深刻的一致关系”。<sup>②</sup> 我们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各有自己的特征,确是事实。但斯宾格勒所概括的各个文化的基本“象征”是没有物质基础的,是“先验”地存在的,不需要科学地说明,只需凭“本能”、“直觉”去理解。需要指出的是:既然斯宾格勒认为各个文化之间是根本互不理解的,他自己又如何能理解西方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呢?

斯宾格勒还把文化看作一个有机体,都要历经前文化时期、文化时期和文明时期,即青春、生长、成熟、衰败等阶段,有如人的童年、青年、壮年与老年。文化是一个被他看作正在成长的、创造的、上升的阶段。文明则是各个文化的结束阶段。他是在一种贬抑的意义下使用文明这个概念的,它的含义是已成、僵化、结束、死亡等等。由于各个文化不论具有如何不同的特点,但都要遵循同样的轨道,历经生长盛衰,最终走向死亡的归宿,因此只要两件事实在各自的文化的严格一样(相关)的位置上发生,就是“同时代的”,就是可以比较的。<sup>③</sup> 例如海克索人统治埃及时期和19世纪的欧洲是“同时代”的,因为都处于他所说的“文明”的开始时期。他有时又称这种研究方法为“比较形态学”。

总之,斯宾格勒关于世界历史只是各个文化的历史,它们各具特质、互不了解的说法,实质上是否认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否认人类的统一发展,这一否认后来变成了法西斯种族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教条。卢卡奇正确指出:这种“历史‘形态’的唯我主义本质对于法西斯的种族主义说来是一个方法论上的范例。法西斯对待其他种族的那种野蛮的非人道态度的‘哲学’根据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唯我主义的种族结构上的:种族之间完全陌生、互相敌对、壁垒森严、互不沟通的情况恰恰就像斯宾格勒的文化圈之间的关系一样”。<sup>④</sup> 斯宾格勒把文化看作有机体,都要经历生长盛衰,最终走向死亡的

<sup>①</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5页。

<sup>②</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5页。

<sup>③</sup> 英译本,第1卷,第112页。

<sup>④</sup>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19页。

看法，则是否认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但在这里他又埋下了一个伏笔，即世界上其他文化都已死亡，唯独西方文化尚有生命，关于这点我们在下面将加以论述。

## 二

斯宾格勒的书名为《西方的没落》，实则是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核心内容是德意志民族统治世界的历史“宿命”。

斯宾格勒表面上否认各个文化之间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但通过强调西方文化的特殊精神而实质上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他说：“这种使各大文化都把我们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绕着我们旋转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的最恰当的名称可以叫作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这本书里用来代替它的体系，我认为可以叫作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sup>①</sup>斯宾格勒一面作这样的表白，另一面则说西方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浮士德心灵”，“它的原始象征是纯粹的和无限度的空间”。<sup>②</sup>他赞扬西方文化的地理眼界之广大，是其他文化无与匹敌的。“祖国的广袤是一个个人很少看到它的边界，可是要保卫它并为它而死的地区，它的象征性深度和力量是其他各个文化的人类所永远不能理解的。”<sup>③</sup>“浮士德文化对扩展——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的倾向是无法抗拒的。”<sup>④</sup>于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于美洲人民的血腥屠杀，对于墨西哥和秘鲁的征服，在他看来，不是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结果，而是由于“浮士德文化的人”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sup>⑤</sup>显然可见，斯宾格勒是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对外侵略行为冠以

<sup>①</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 17 页。

<sup>②</sup> 英译本，第 1 卷，第 183 页。

<sup>③</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 237 页。

<sup>④</sup> 英译本，第 1 卷，第 335 页。

<sup>⑤</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 101 页。

“浮士德精神”的美名，并把它们说成了西方文化的必然的外在表现。<sup>①</sup>

斯宾格勒强调西方文化有一种特殊的“宿命”。“宿命”在他的历史哲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首先从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入手，然后导出他的“宿命”哲学。自然和历史，在他看来，是高级文化的人类用以综合和解释他的直接感官印象的两种形状，或者说是在人的醒觉意识中轮流出现的两种世界图景。当把一个人的周围的现实作为已成的事物而加以整理时，所得出的世界图景就是作为自然的世界；反之，当把现实作为方成的事物加以整理时，所得出的世界图景就是作为历史的世界。在作为自然的世界里，适用的是因果关系，即无机的逻辑，而在作为历史的世界里，它的活生生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是因果律所能说明的，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宿命，是有机的（本能的）逻辑。理解自然靠理性，理解历史则要靠本能，靠直觉，靠类比。<sup>②</sup> 斯宾格勒强调，只有通过历史和自然的对立，才能理解历史的本质。<sup>③</sup> 那么，历史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他说：生活中的有机的必然性，即宿命的必然性“构成了全部历史（与自然相对而言）的实质和核心”。<sup>④</sup> 真正的历史是充满宿命，却摆脱了定律的。因此，深刻的和纯粹的历史研究，决不会寻求与因果律相一致。<sup>⑤</sup>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宾格勒是一个十足的反理性主义者，他的历史观充满了神秘主义、蒙昧主义，他坚决反对历史的客观规律，只承认历史的宿命，而这种宿命又不是认知的对象，只能靠本能、直觉、生命体验去捕捉。把宿命强调到全部历史的实质和核心的地步，其实质是要把剥削阶级的所行所欲都归之于宿命的决定，从而赋予它们以一种天启、宗教的力量。希坡主教奥古斯丁把“神的意志”看作是最后的决定因素，其实“神的意志”和“宿命”都是一回事，不过是剥削阶级意志的代名词而已。

斯宾格勒从他的“宿命哲学”中推导出一种什么样的西方文化的“宿

<sup>①</sup> 斯宾格勒经常歪曲歌德的思想。歌德所写的诗剧《浮士德》反映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与反动的、蒙昧的中世纪封建意识的斗争。歌德所创造的浮士德，是一个追述真理，追求宇宙意义而又热爱人生的人物。这种真正的浮士德精神，完全被斯宾格勒歪曲了。

<sup>②</sup> 参见，英译本第5、8、25、49、95、100、102、107等页。

<sup>③</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52页。

<sup>④</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6页。

<sup>⑤</sup> 英译本，第1卷，第95页，第118页。

命”呢？

斯宾格勒武断地说，世界上共有过 8 个文化，其中 7 个（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已经死亡，只是“作为一些死尸，一些无定形、无精神的人群，一种伟大历史的碎片而存在下去”。<sup>①</sup> 只有西方文化还处在文明的第一个时期——“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连绵不绝的大战和革命，一个文化区内的各个国家经过互相攻伐以后，最终合并于一个大帝国的统治之下。从拿破仑的统治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西方文化的“战国时期”的序幕，20 世纪则是真正战国的世纪。下面是斯宾格勒关于“真正的战国世纪”的形势所作的描绘以及他认为西方人所应持的态度：“各个大陆将被孤注一掷，印度、中国、南非、俄罗斯、伊斯兰将被召集，……主要的世界都市的权力中心将随意处置较小的国家——它们的领土、它们的经济以及它们的人民。……在这些血和恐怖的灾难中，一再响起了要求民族和解、世界和平的呼声。……我们可以尊重追求这一切的愿望，但是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事实的真相……生活如果要成为伟大的，应是坚强的；它只允许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允许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选择，胜利的牺牲品是属于胜利的。”<sup>②</sup> 继战国时期以后出现的一个阶段，是“帝国时期”，这时战国的对峙局面结束，大一统的帝国出现。在此阶段，“血统的权力，未受破坏的身体力量，恢复了它们从前的统治地位。种族出现了，纯粹而不可抗拒——强者战胜，赘余的人则成为他们的战利品”。<sup>③</sup> 斯宾格勒还强调：“帝国主义是不论何种文明的十分必要的产物，因而当一个民族不肯承担主人任务的时候，它就为他人所掌握，置于统治之下。”<sup>④</sup> 其他各个文化的这个时期都已过去，西方文化的这个时期尚未到来，约在 2000—2200 年间。斯宾格勒给这个时期的政治组织形式起了一个名称——“恺撒主义”。“恺撒主义”的特征是：“真正的重要性集中在完全个人的权力，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是恺撒，或其他任何能在自己的位

<sup>①</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 38 页。

<sup>②</sup> 中译本，下册，第 520—521 页。

<sup>③</sup> 中译本，下册，第 523 页。

<sup>④</sup> 中译本，下册，第 512 页。

置上行使它的人。”<sup>①</sup>我们还需知道，斯宾格勒是把德国民族看作西方最后一个民族的，它负有完成西方历史最后一个阶段的伟大使命。<sup>②</sup> 把以上几点联系在一起，就可清楚地看出《西方的没落》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巨著，无非就是要说明一个核心思想：西方文化是世界上惟一还有生命的最优越的文化，20世纪是西方人的世纪，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宿命就是主宰全球，建立起一个世界大帝国。

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还有作者鼓吹其政治主张的许多内容，必须认真研究这些部分，才能了解斯宾格勒编造他的哲学体系的政治目的，以及《西方的没落》为何能在出版后风行一时的原因。不少评论这本书的人几乎不涉及书中的政治内容是错误的，因为单就哲学体系而言，斯宾格勒相当浮浅，不值得多费笔墨。卢卡奇说得对：“按照狄尔泰甚至席美尔的尺度来衡量，斯宾格勒连作为一个客串艺人或业余爱好者也时常不能算是有才华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说是浅薄和轻率的。”<sup>③</sup>

斯宾格勒怀着“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sup>④</sup>对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肆口谩骂，无所不用其极。他攻击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认为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者别有用心的捏造，因为根本就没有工人阶级这样一个阶级的存在：“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工人阶级；那是一些专门注视着英国——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工业发达的、无农民的国家——的工厂工人的地位的理论家的一种捏造，随后他们又信心百倍地把这种捏造的体系扩展到一切文化和一切时代，使政客们得以采用这种体系，把它当作自己建立政党的一种手段。”<sup>⑤</sup>斯宾格勒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决定的时刻》中，干脆就把工人阶级叫作“人类的寄生虫”，主张他们每日至少应当劳动12小时，如同在资本主义制度早期那样。<sup>⑥</sup> 他百般丑化、诋毁工人运

<sup>①</sup> 中译本，下册，第523页。

<sup>②</sup> 中译本，上册，第166页。

<sup>③</sup> 《理性的毁灭》，第410页。

<sup>④</sup> 这里借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随着资本主义腐朽程度的加深，资产阶级学者反对认真的科学的研究的这种卑劣感情更加激烈了。

<sup>⑤</sup> 中译本，下册，第570页。

<sup>⑥</sup> 《决定的时刻》(The Hour of Decision)，纽约，1934年，第145、151等页。

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袖。他一口咬定“工人运动是它的领袖们制造出来的”，“实际的共产主义及其‘阶级战争’……不过是那十分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共产主义的大资本的忠实随从而已”。他还诽谤“群众领袖中百分之五十是可以用金钱、职位或‘从底层进来’的机会加以收买的，他们把他们的整个政党都带过来”。“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甚至共产主义者的运动不是为了金钱的利益而举行的，不是按金钱所指明的方向而开展的，不是在金钱所许可的时限内进行的。”<sup>①</sup>

19世纪后半期，德国工人运动在欧洲处于中心地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工人群众中有很多拥护者。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日益深入的影响，斯宾格勒提出了一种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他给这种社会主义所下的界说是：“一种超越所有阶级利益的伟大政治经济制度在人生中实现的意志……这是一个具有高尚思想和责任感的体系，它使整个社会为它的历史的决战保持良好的状态。”<sup>②</sup>他还说，在目标方面有最大可能成就生命感的，是伦理社会主义，“不管伦理社会主义在前景中的外观如何，它都不是一个有关同情、人性、和平和热情关切的体系，而是一个权力意志的体系……它的目标是十足帝国主义的；它所讲的福利，是扩张意义上的福利，也就是说，不是病人的福利，而是精力旺盛的人的福利，他们应该被赋予并必须被赋予行动自由，而不顾财富、出生和传统的障碍”。<sup>③</sup>他强调：“我再说一次，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权力，权力，还是权力。”<sup>④</sup>按照他所说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标准，最早社会主义者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而不是马克思。<sup>⑤</sup>在《普鲁士与社会主义》一书中，他赤裸裸地把社会主义与普鲁士主义等同起来，主张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一种军事化了的国家，在那里每个工人和业主都成了国家的公职人员，在严格纪律和普鲁士式的严峻环境中为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工作。他鼓吹，“德国劳工中的优秀部分要与持有旧的普鲁士国家观念的最优秀的人物实行联合，因为这两类人都有决心要建立严格的社会主义

<sup>①</sup> 中译本，下册，第638页。

<sup>②</sup> 中译本，下册，第774—775页。

<sup>③</sup> 英译本，第1卷，第361—362页。

<sup>④</sup> 转引自阿瑟·赫尔曼：《文明衰落论：西方文化悲观主义的形成与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4页。

<sup>⑤</sup> 英译本，第1卷，第138、347页。

国家……都愿意为了统治别人而服从,为了征服别人而付出生命”。<sup>①</sup>

站在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立场上,斯宾格勒极力鼓吹强权政治和侵略战争。他说:“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它总是为了强权和种族而牺牲真理和正义,把那些相信真理和正义、藐视业绩和权威的人们和民族置之死地。”<sup>②</sup>“战争是一切伟大事物的创造者。生存之流中一切有意义的事物,都是通过胜利和失败显现出来的。”<sup>③</sup>在他看来,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不为刀俎,必为鱼肉。要想不为鱼肉,必须先发制人。“一个民族在世界上不是孤零零的,它的前途将由它对其他民族和强国的力量对比,而非由它的纯粹内部安排来决定。”因此,政治家要把对外政治的地位摆在对内政治之上。“对内政治全然是为对外政治而存在的,而非相反。”<sup>④</sup>

斯宾格勒的研究方法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的认识论是极端浮浅而又极端武断的。他否认真理的存在,说:“对于一个动物来说,没有真理,只有事实;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只和事实打交道。有行动、有意志、有斗争的积极的人物天天衡量自己在事实的威力跟前的力量,他把纯粹的真理看得很不重要。真正的政治家只知有政治的事实,不知有政治的真理。”<sup>⑤</sup>他还说:“在事实的世界中,真理只是手段,它只有主宰精神从而主宰行动时才是有效果的。它们的历史地位并不取决于它们是不是深刻的、正确的或仅是合乎逻辑的,而是取决于它们发不发生作用。”<sup>⑥</sup>斯宾格勒既然否定在历史的世界里存在真理,就必然走向不可知论和信仰主义。“植物生活着,但并不知道它自己是在生活着。人类则被他的生活所惊,并环绕他的生活发生种种问题。但是,人类也不能对他自己的问题作出解答,他只能相信他的解答是正确的,在这方面,亚里斯多德和最卑贱的野人是没有区别的。”<sup>⑦</sup>还必须指出的是:斯宾格勒在认识论上是彻头彻尾反理性主义的。他强调“本能”、“直觉”、“天生的嗅觉”等,大言不惭地向人们推荐他的一种独特的

<sup>①</sup> 转引自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16页。

<sup>②</sup> 中译本,下册,第599页。

<sup>③</sup> 中译本,下册,第444页。

<sup>④</sup> 中译本,下册,第538页。

<sup>⑤</sup> 中译本,上册,第66页。

<sup>⑥</sup> 中译本,下册,第489页。

<sup>⑦</sup> 中译本,上册,第66页。

研究方法,就是“相术的机智”。什么是“相术的机智”呢? 经过他的一番解释后,原来就是那种相人相马的本领。“天生的政治家……具有一种毫不踌躇地和不屈不挠地领悟全部可能性的‘眼力’。马匹的鉴定者在一瞥中就能了解一匹马,就知道这匹马在竞赛中能有什么希望。不认识一件事情就能正确地做好那件事情,双手不知不觉地把马衔勒紧或放松——这种才能与理论家的才能是恰好相反的。一切存在的秘密节奏在他身上和在历史事件中是同一样的。”<sup>①</sup>斯宾格勒为了建立他的比较文化形态学体系,硬是把一堆堆杂乱的材料经常地、大量地通过“类比”的方法,生拉硬扯地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如前所述,斯宾格勒既然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独具特质的和互不理解的,那么在它们之间就不可能发生任何的关系。但这样一来,比较文化形态学就无法建立起来的。因此,他首先独出心裁地杜撰了一个“同时代的”概念(见前),然后不同的事实、不同的人物,不论在真正的年代学上相距多远,只要是在斯宾格勒的形态学分期上处于“同一时代”,就可以拿来相比。于是,亚历山大可比拿破仑;柏拉图可比拉普拉斯,如此等等,任意摆弄,有如儿戏。类比是一种研究方法,在历史科学里,类比必须以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为基础。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第2版序言中说:“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恺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尔之间的共同点更多。”<sup>②</sup>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在谈到各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纲领加以比较时,说:“这样的比较必须作得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所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比。”不仅在历史科学中,在比较文学中,也要有历史观念。陈寅恪说:“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

<sup>①</sup> 中译本,下册,第532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0—581页。

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sup>①</sup>斯宾格勒的“同时代的”，是非历史的，因而他以“同时代”为基础运用的类比法，其结果也就只能是“穿凿附会，怪诞百出”的。

总之，斯宾格勒认为，凭借理性、科学是不能洞察历史的奥秘的，“一个历史研究者致力于真正的科学越差，他的历史学反而就更有价值”。<sup>②</sup>

### 三

《西方的没落》一书，就哲学思想而言，是浅薄的，根本谈不上“创造性”，绝对不像斯宾格勒自我吹嘘的那样是什么“当代的唯一哲学”。他公开承认歌德和尼采对他的影响，<sup>③</sup>但实际上尼采对他的影响最大。尼采的“超人”哲学，“权力意志”和非理性主义，文化与文明对立的学说，对战争的歌颂，对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仇视，都是斯宾格勒思想的来源。斯宾格勒的其他一些重要论点，例如作为历史的世界与作为自然的世界的区别，则来源于狄尔泰关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有着根本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看法；每一种文化各具特质、各自独立的文化观则是由李凯尔特的文化乃是以独特的价值为取向的定义引申而来的，<sup>④</sup>只是他的自负使他不愿意承认而已。退一步说，即使斯宾格勒没有受过狄尔泰等人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因此他的哲学就算不得独一无二了。《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内容从自然科学谈到社会科学，从文艺谈到宗教，似乎十分丰富，如不仔细去看，就会觉得斯宾格勒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实不然。就知识而言，他比较熟悉的还是西方文化，而对书中涉及的其他文化，只有一知半解，甚至盲无所知。例如，他竟把李斯的老师荀子当做孙子，<sup>⑤</sup>这暴露了他的中国历史知识贫乏到了何等的程度，可是他却敢在书中多处侈谈中国文化。那么，为什么这样一本就哲学思想而言十分浅薄，就知

<sup>①</sup>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3—224页。

<sup>②</sup> 英译本，第1卷，第154页。

<sup>③</sup> 中译本，上册，《作者修订版序言》第2页。

<sup>④</sup> 参见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29页。

<sup>⑤</sup> 中译本，下册，第508页注。

识内容而言错误百出的著作,竟能在出版后风行一时呢?原因究竟何在呢?

首先,《西方的没落》迎合了第一次大战后战败的德国重整旗鼓的政治需要。战争结束后,德帝国主义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力图卷土重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十月革命成功后,社会主义理想日益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德国革命运动在1919—1923年间有过几度的高涨,德国统治阶级对此深感恐惧,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形势下,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迫切需要各式各样的反动理论,为自己打气,以便对内镇压革命,对外进行复仇。《西方的没落》恰恰在此时出版,它以学术巨著的面目出现,表面上似在讲西方的没落,实则企图通过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宏观描述,论证德意志民族的前途绝非暗淡,而是大有希望,它将在“帝国时代”实现统治全世界的历史“宿命”。斯宾格勒本来寄希望于德国的胜利,1914年10月25日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我们会赢。”<sup>①</sup>在《西方的没落》的第一卷(1917年已完稿)中,他说“普鲁士—德意志民族有过三次伟大的时刻”,1914年就是其中的一次(另两次为1813年和1870年)。<sup>②</sup>德国战败,出乎斯宾格勒的预料,但他并未因此而沮丧。战后,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悲观主义》的文章,对布鲁克等人对《西方的没落》一书所提出的批评进行回击。布鲁克指责斯宾格勒是时下流行的阴暗论与毁灭论的传播者。斯宾格勒反驳说,恰恰相反,他是预言家,预言了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包括魏玛共和国在内的腐败西方的最后一幕的终结。<sup>③</sup>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说:“如果注定要失望的恰恰是人们所最珍视的希望,那么,一个稍有价值的人是不会因此手足无措的。”“我觉得,告诉后代的人什么是可能的——因而也是必需的——什么是他们的时代的内在可能性所没有包含的,这教训对他们是有益的。”他希望新一代能被他的书打动,“从而委身于技术而不委身于抒情诗,委身于海洋而不委身于画笔,委身于政治而不委身于认识论”。<sup>④</sup>

正是斯宾格勒这种顽强的“复兴精神”,使他成为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容

<sup>①</sup> 《文明衰落论》,第257页。

<sup>②</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38页。

<sup>③</sup> 《文明衰落论》,第260页。布鲁克是《第三帝国》一书的作者。

<sup>④</sup> 中译本,上册,《导言》第43页。

克地主以及一切右派分子的宠儿,成为右翼青年心目中的英雄。纳粹分子在夺取政权成功以前曾经有过一种心态,他们说:“虽然我们可能是没有希望的,然而我们却具有劫数已定的人们的希望。”“充分意识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和文明的没落,我们仍然要求每一个骄傲的战士的权利——为了一个目的去战斗,尽管那个目的似乎是失去了。”<sup>①</sup>这样的心态与斯宾格勒的心态正好是合拍的。

其次,斯宾格勒宣扬的西方文化优越论,也使一般西方资产阶级在心理上得到安慰。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战时,西方有识之士已经感到前景不妙。英国外交大臣葛雷悲叹说:“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战后,同盟国的统治阶级固然因失败而沮丧,协约国的统治阶级也被巨大的战争损失、经济的残破和战后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搞得焦头烂额。法国历史学家西蒙在《精神的历史》一书中写道:“在1914年的炮声中,对现在所抱的信心和对历史威力的信仰完全毁灭了。人们胆战心惊地意识到,历史不仅是过去的事,就连他本人也是绝望无援地挣扎在历史的洪流中,不知道这个洪流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历史作为这样的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那时它曾可能是一条美丽的河流,人们饶有兴趣地沿着它上溯航行,或是心情愉快地从大地上向它眺望。现在人们对历史,是从它的实际状况来理解的,也就是把它理解为使人随波而走的一种流动的元素,把它理解为海洋,在这个海洋里人们的意志和厄运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细心地描绘出一条曲折的航路,而航行的目标则从来不能预知,而且总是在什么地方可能遭难。”<sup>②</sup>这段话生动地描绘出在西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界中弥漫着的悲观气氛,他们对前途已经不再像战前那样充满希望和信心。斯宾格勒的著作虽然也讲西方的没落,但又断言与世界上已经死去的7个文化比较,西方文化尚未走到尽头,仍有生命,这就使那些感到前途莫测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界至少仍怀有希望。

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对后来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斯宾格勒的历

<sup>①</sup> 杜德:《法西斯主义和社会革命》(R. Palme, *Fasc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1935年,第2版,第229页。

<sup>②</sup> 转引自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史哲学以及由这种哲学导出的政治主张,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个来源。斯宾格勒的种族主义学说与纳粹党的种族主义是基本一样的。斯宾格勒认为种族的基石是血与土。血与土具有一种神秘的性质,是理性、科学的分析所无法说明的。一个纳粹作家也写道:“只有德国土壤——块状土壤——的出产物才能制造德意志人的血液。那种决定德意志人种型的微妙颤动,只有通过这种出产物才能传送到血液,再从血液传送到身体和灵魂中去。德意志人种型之所以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种型,是因为世界上只在一处有德国土壤。”根据这种理论,当1935年德国因需要大量进口军事物资而不得不削减进口柠檬时,这个作家就主张服用土产的大黄叶梗,这不仅因为它味道可口,“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清血药剂,特别是用于德国人种型”。<sup>①</sup> 斯宾格勒和纳粹党的日耳曼种族优秀论,是荒谬绝伦的,在科学上是毫无根据的。但正如纳粹德国的一位教授所坦言的:“血和种族的世界观的强调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运动中并不意味着科学的理论,而是意味着反对国际列强的最愤激的战斗。”<sup>②</sup> 斯宾格勒的社会主义与纳粹党的社会主义绝妙地一致,虽然一个的招牌是“普鲁士社会主义”,另一个的招牌是“民族社会主义”,但二者都是在“社会主义”旗号的掩盖下,驱使广大劳动人民为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利益服务,只是斯宾格勒对纳粹党通过蛊惑群众的手段建立起来的法西斯专政这种政权形式(不是实质)和它的“暴发户”的领袖不甚满意而已。此外,对群众的贱视,对理性的贬低,对战争的歌颂,对服从和迷信的赞扬等,都是斯宾格勒与纳粹分子的共同思想。纳粹党的一些头目对斯宾格勒十分尊敬,罗森伯格向希特勒强调斯宾格勒作为德国“真正的”思想家的重要性。斯特拉瑟曾于1925年写信给斯宾格勒,表示敬意,请他对纳粹党思想和斯宾格勒自己思想之间的相似性给予重视。斯特拉瑟说,纳粹党也希望“通过德国社会主义进行一场德国革命”。斯宾格勒的思想在本质上与纳粹党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也曾在1932年的选举中投了希特勒的票,但他鄙视群众,从而也看不起纳粹党通过群众运动夺取政权的办法,他也看不起希特勒,说“他不是一个英雄的男高音”。他认为有资格充当

<sup>①</sup>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下册,第658—659页。

<sup>②</sup> 见《第三帝国和它的思想家:文件集》(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enker, Dokumente),柏林,1959年,第50页。